

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

媒介演化论

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 ■ 潘祥辉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 /
潘祥辉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4

(21 世纪媒介理论丛书/邵培仁主编)

ISBN 978-7-81127-430-1

I. 媒… II. 潘… III. 传播媒介—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心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8421 号

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

作 者 潘祥辉

策 划 欣 文

责任编辑 蔡开松

责任印制 曹 辉

装帧设计 大鹏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86-10-65450532 65450528 传真：65779405

http: //www. cucp. 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mm 1/16

印 张 22.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7-430-1/G·430 定 价：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历史转折关头的明智选择

——《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序言

今天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形象,已昂然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让人刮目相看。世界惊奇地发现,中国社会面貌光彩焕然,已非昔日可比,这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

回首过去,我们看到了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微笑,同时也看到了艰辛的汗水和坚实的脚步。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与我们的时代同命运、共呼吸,演绎出激越曼妙的交响,我们既取得了累累硕果,也面临着重重挑战。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学者,我亲身体验、感受到了这些年中国学界所走过的不凡历程,可以说是发展与困惑同在,成就与问题并存,我深深体会到祖国给予的坚强支撑,历史带来的巨大机会。

人至三十当是而立之年,而当中国改革开放迎来它的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似乎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处

于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选择之中,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

第一,要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当一门学科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先静下心来,反思和回顾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回顾和总结媒介研究的历史,并不是要沉溺于它、迁怒于它,而是要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累积经验,为当下的媒介理论和媒介现实服务。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历史,要联系现实,研究现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才能使媒介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第二,要以媒介为经,以社会为纬。新闻是社会的镜子,媒介是社会的大脑。研究媒介需要联系社会,研究社会需要指向媒介。媒介是这一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因此,研究媒介理论,需要以锐利的学科眼光加以审视和分析,也要用社会的尺度来丈量 and 称衡;要强调媒介理论思维与话语的主导性,也要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和扩展。以媒介为经,可以确保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社会为纬,可以落实其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媒介研究,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第三,要以规律为经,以意义为纬。规律所在,科学所托。积极探索和揭示媒介规律,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基本宗旨和首要使命。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媒介理论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探索和揭示媒介活动中内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和斗争的客观法则和必然趋势,还应该突现和彰显这一过程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说服人们自觉遵循媒介规律,主动按媒介规律办事,从而进一步支配、制约和优化媒介活动的姿态、现状与趋势。规律、意义和行动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金三角。

第四,要以中国为经,以世界为纬。中国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坐标点,而世界则是它的参照系。如果媒介理论研究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

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不能指导具体的媒介活动,而只是简单地贩卖、照搬和空谈西方媒介理论,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但是,要推进媒介理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则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在坚持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

正是出于这种思考与选择,我们组织撰写和出版了这套《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这套丛书宛如一阁雅集,泛着书香,和着墨韵,透着笔力,跳着新意,凝着理性,闪着睿智,翻阅在手,会让人感到亲切可读,不忍释卷。这套丛书绝不泛泛而谈,更不人云亦云,而是深刻专注于一论,以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观照媒介万千世界的复杂性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如同透过一个视窗看到了万花筒的一次奇妙变换,或者像是随着一位导游进入一个秀丽壮美的旅游胜地,眼前美景让人不由地击节赞叹。

这套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努力将问题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掘。同时,丛书作者尽力不受媒介理论研究中传统范式和旧有成果的束缚,面向现实,立足交叉,追踪前沿,聚焦集成,努力把内、外两个学术世界的优点和精华收归己用,并积极探索适合课题对象和内容研究模式、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毕业的博士生,寒窗苦读之后,学术成果斐然。如今,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

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这批浙江传播学人呕心之作的一次全面检阅。

我们深知,学术研究犹如探险,入之愈深,得之愈奇。值得庆幸的是,时代在感召着我们不断求索进步,我们所做的,只是承继前辈的脚步往前多迈了一步,仅仅是负起了这代学人应负的社会义务、历史责任,本不该有“探骊得珠”的奢望,但若这套丛书能为媒介理论研究和媒介运营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为中国媒介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建设稍尽绵薄之力,又能引起媒介学界和业界人士的一些关注和批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和鼓励了。

邵培仁

2009年3月于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目 录

导 论	探寻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中国媒介转型的历史脉络与深层逻辑	/ 1
第二节	理论框架:历史制度主义与媒介制度分析	/ 11
第一章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	/ 23
第一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时段	/ 23
第二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	/ 34
第三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层次	/ 64
第二章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规律	/ 71
第一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政治、社会变迁同步共振	/ 71
第二节	媒介演化的动力与形态取决于行动者的博弈均衡	/ 84
第三节	媒介竞争推动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	/ 94
第四节	媒介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的创新与扩散过程	/ 109
第三章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模型	/ 115
第一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动力	/ 115
第二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子	/ 121
第三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	/ 126
第四章	行动集团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134
第一节	行动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机制	/ 134
第二节	西方传教士及商人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137
第三节	知识分子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145

第四节 新闻界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151

第五节 政府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158

第五章 意识形态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172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制度功能 / 172

第二节 媒介意识形态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 / 177

第六章 国际体系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194

第一节 国际体系与中国社会的转型 / 194

第二节 外国力量在中国设置的媒介演化路径 / 197

第三节 外国媒介对中国媒介制度的作用机制 / 214

第四节 国际体系与1978年以来中国媒介制度变迁 / 221

第七章 媒介传统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5

第一节 媒介传统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机制 / 235

第二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三个传统 / 240

第八章 技术力量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66

第一节 媒介技术创新与媒介制度创新互为因果 / 266

第二节 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制度变迁的机制 / 283

第九章 潜规则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 / 302

第一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潜规则及其表现 / 302

第二节 潜规则的制度根源 / 312

第三节 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20

结 语 博弈、效率与媒介制度的“理想类型” / 337

参考文献 / 345

后 记 / 351

导 论

探寻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当前中国大陆新闻界正处在深刻变化中,这个变化究竟是翻天覆地,不再走回头路了?还是瞻前顾后,进两步,退一步?目前我们很难下定论。相信这些问题必须放在多元的架构中来检查。整个变化当然并非毫无轨迹可循。

——李金铨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中国媒介转型的历史脉络与深层逻辑

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转型特征。汪丁丁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唯一的“三重”转型:文化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这三重转型同时展开,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特征^①。这三重转型都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完成这一过程尚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可以想见,今天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还将染上转型期的特征。转型期社会为中国媒介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单子”^②,与此同

① 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I》,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 喻国明认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好新闻永远是和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而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无视时代发展在本领域设定的关键问题、瓶颈问题,是学术勇气和责任感缺失的表现。新闻学术研究必须跟新闻传播领域在不同时期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参见喻国明《中国新闻业透视》、《解析传媒变局》、《嬗变的轨迹》等著作。

时,中国媒介本身的转型也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单”,这是一个中国语境下极具本土色彩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可以说,“转型与变迁”是中国媒介生态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最主要的“特色”,构成我们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主要的“脉络”(context)。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充满了乱象:“寻租”盛行、低俗成风、专业主义缺失。“机会主义”和“实用理性”支配了媒介从业人员的行为逻辑。“总编辑们坦承患了精神分裂症,报纸前几页支持计划经济,中间几页提倡混合经济,剩下的就鼓吹市场经济了。记者们对于有偿新闻已习以为常。”^①显然,这一切的背后有其制度根源。李金铨在《从文化中国看当前中国媒介的深刻变化》一文中说:“当前中国大陆新闻界正处在深刻变化中,这个变化究竟是翻天覆地,不再走回头路了?还是瞻前顾后,进两步,退一步?目前我们很难下定论。相信这些问题必须放在多元的架构中来检查。”^②的确,没有一个多元的分析架构,没有一种历史的、具体的逻辑分析,我们就无法从现象探究到本质。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假设

任何转型或改革都是一系列制度的重新调整。因此,媒介的转型其实质是媒介制度的变迁^③。这种变迁显然与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的“三重转型”联系在一起。

那么,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轨迹是什么?其内在的逻辑又是什么?

著名社会学家 C. Wright Mills 说:“如果我们想理解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动态变化,就必须尽力洞察它的长期发展,并根据这些发展设

① 李金铨:《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的交光互影》《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② 李金铨:《从文化中国看当前中国媒介的深刻变化》,见何舟、陈怀林编著:《中国传媒新论》,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序言第7页。

③ “媒介制度变迁”与“媒介转型”或“媒介改革”等话语概念存在一定的重合,本书用“媒介制度变迁”的概念基于这一认识:任何媒介的转型或改革本质上都是一系列媒介制度的调整(包括制度删除、修改与增加)。“媒介改革”局限于言说1978年以来的媒介转型,而“媒介转型”概念具有相当的模糊性。根据 Stark 和 Walder 等人的研究,实际上转型的不是媒介,也不是市场,而是界定媒介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因此用“媒介制度变迁”描述与解释中国的媒介改革或转型,更接近媒介问题的核心,也更具学理意义。

问:这些趋势发生的机制是什么,该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是什么?正是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我们才能深入涉及这些趋势。”^①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考察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其演化的机制,并将其置入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时空内进行研究。因此,正如诺思所认为的,制度分析总是倾向于变成历史学。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历史是某种事件生发的时机和环境,任何制度都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具体遗产,因此,应强调先发事件对后发事件的优先性^②。今天中国媒介的转型与历史显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忽视或割裂这种联系都会造成观察视角上的盲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的集体选择的过程,受到各种内源性与外源性因素的影响,它在历史中演化而成,又受历史的深刻影响,离不开对媒介历史的分析。

如果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媒介转型不是始于1978年,而是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这一进程,从邸报模式到现代报业是中国媒介的第一次转型,这一转型是19世纪以来中国大规模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媒介转型就融入了全球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个“冲击调整适应”的过程,1978年以来的媒介改革只不过是这一长时段媒介转型过程中的恢复与继续。比较晚清以来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和今天正在发生的媒介改革,不论其演化轨迹、变迁机制还是影响因素都具有很多共同点。晚清与当代,显然构成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链条中的首尾两链。

因此,考察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我们必须把时间回溯,把这一进程“嵌入”到19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过程中。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刊又次之。”^③可见,现代意义上的

① C. 赖特·米尔斯著,陈强等:《社会学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3页。

② Cf., Hall, Peter A. (2000), "Aligning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repared for 2000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and Pierson, Paul (2000), "The Limits of Desig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Origins and Change", in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13, No. 4, pp. 475—99.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媒介”确始于 19 世纪初期^①，一开始就是“外来植入”的结果。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初始设置会影响制度的演化与变迁。那么中国近现代媒介的这种“外来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今天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其演化路径如何，是否存在路径依赖与锁定呢？

制度学家伊茂卡特(E. M. Immergut)认为，由于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causality)、偶发性(contingencies of history)与不规则性(irregularities of history)，所以应该拉长观察制度变迁的时间序列来看待制度的变化^②。显然，在解释中国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上，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以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为研究对象^③，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本书力图透过各种媒介现象，看到媒介发展和演化的根本动因，对中国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作一个比较系统的考察，发掘现实与历史的勾连。为此，本书必须回答如下一些问题：

1.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媒介制度？其特点是什么？

2. 中国媒介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其轨迹与特征是什么？

3.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媒介制度的变迁是否有其特有的逻辑与模式？

4. 有哪些因素影响、制约着中国媒介的制度变迁？

① “媒介”与“传媒”在内涵上基本一致，因为媒介必然是一种传播媒介。本书的“媒介”等同于麦奎尔所讲的“大众媒介”：“指公开并且在较短时间就可以达远距离的众多接受者的有组织的传播。”（参见麦奎尔：《大众麦奎尔传播学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 页。）笔者用“媒介”而不用“传媒”实际上是源于对“媒介”这一术语的偏好，此外，用“媒介”一词较为宽泛，可以将从电影、出版至板报、墙报等传播形式整合进来，这些媒介形式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巨大功用，应该纳入到媒介制度的研究范围。

② 胡婉玲：《论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新世纪智库论坛》第 16 期，2001. 12. 30，PP91—92。

③ 本书讲的“机制”相当于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在《社会宏观动力学：探求人类组织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一书中所讲的“force”，即“动力”或“作用力”。在乔纳森看来，社会世界，包括制度体系的形成过程都决定了人类的行为、互动和组织的“各种力量”，正是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动力装置。乔纳森开创了社会变迁的动力学研究，他提出了社会宏观动力学的十个定律，并对中观动力学和微观动力学也有揭示，多有创见。本书吸收乔纳森的“社会演化动力学”思想，用“演化机制”这一概念来指代推动媒介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力。

5. 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给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媒介带来了什么启示,它还将怎样演化下去?

6. 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制度变迁以拓宽媒介研究的视野?

本书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上。为更好地揭示其“发生学原理”,本书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1. 媒介制度变迁遵循历史学家汤恩比与费正清提出的“挑战—应战”模式,只要存在外部挑战,内部的制度安排就会作出调整;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媒介制度的调整也遵循着“适应性逻辑”,“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某一历史条件下,适合“情境”的媒介制度能够被保留下来。

2. 媒介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媒介制度的演化也是一个历史情境渐次展开的过程,媒介制度的如何演化取决于各种行动集团为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展开博弈的过程,博弈的均衡状态即是呈现出来的媒介制度。

3. 媒介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无效率的媒介制度可能长时期地保留下来。但从长时段的媒介制度变迁来看,只有有效率的媒介制度会被保留下来,而那些无效的,维持成本高的媒介制度最终将被淘汰。

二、概念界定:制度、媒介制度、媒介制度变迁

(一)制度

什么是制度?不同的学者对制度有不同的理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①。V. W. 拉坦则认为:制度和组织没有差别。“人们常常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一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一种组织则一般被看做是一个决策单位——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局——由它来实

^① [美]道格拉斯·C. 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

施对资源的控制。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是一种没有差别的区分。”^① 休·E. S. 克劳福德(Sue E. S. Crawford)和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制度的语法》一文中把对制度的看法归纳为三种:(1)制度是一种均衡。制度是理性个人相互理解偏好和选择行为的基础上的一种结果,呈现出稳定状态;稳定的行为方式就是制度。(2)制度是一种规范。他们认为,许多观察到的互动方式是建立在特定的形势下,一组个体对“适宜”和“不适宜”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这种认识往往超出当下手段——目的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规范性的义务。(3)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观点建立在认为许多所观察到的互动建立在一种共同理解基础上,如果不遵循这些制度将受到惩处或带来低效率^②。

可见,静态地看,制度是一种规范或规则;动态地来看,制度是一种博弈均衡^③。前者揭示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后者则进一步揭示了制度的形成机制。从定义的范围来看,“制度”有宽有窄。宽泛的定义将文化、传统、习俗都定义为制度,狭义的制度则仅指成文的规则^④。从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是设计出来,并依赖正式的,有组织的机制来实施^⑤。从本书的研究目的出发,笔者采纳最宽泛意义上的“制度”定义,吸收 V. W. 拉坦的观点,即认为“制度和组

① V. W. 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见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29 页。

② Sue E. S. Crawford, Elinor Ostrom, A Grammar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3 September 1995, pp582-599.

③ [日]青木昌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见孙宽平主编:《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 页。

④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一定义已普遍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他们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们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制度也被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⑤ 内在制度包括了习惯、习俗、文化等形成的认知网络,被内化于个体或组织行动中,其特点是实施依靠自律,不需要第三方的强制执行。外在制度包括了各种正式规则、各种指令和程序性规则等,其特点是由一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并需要第三方来实施。

织没有差别”，同时也将“制度”作为一种规则，一种博弈均衡来看待。

（二）媒介制度

本书中所讲的媒介制度是 media institution, 而不是 media system, 后者通常指“媒介体制”。吸收拉坦和诺思关于制度的定义, 本书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媒介制度”一词: 既指媒介组织, 也指媒介运行的内外部规则。其定义指“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因此, 媒介制度有两个含义, 一指媒介组织; 二指媒介运行的规则。媒介制度能够等同于媒介组织, 是因为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制度体系, 从广义上讲, 组织是制度的产物。和其他组织一样, 媒介组织也是以科层制度为结构特征的若干人的集合, 他们遵从同一套内部制度, 以实现共同的目标, 这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是他们各自目标集的交集, 或者是各自目标集的并集^①。当然, 狭义的媒介制度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狭义的媒介制度专指媒介运行的程序与规则。这种程序与规则又有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 涉及到政府管理、媒介采编管理和媒介经营管理三个领域和层次的成文规则与不成文规则。狭义的媒介制度及其内涵可以用图 0-1 表示。

从图 0-1 可以看出, 媒介制度不是一个单项制度, 而是一个制度系统, 是由各项具体制度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媒介制度具有制度系统的共同的特征: 相关性、层次性以及演化过程中的次序性^②。媒介制度系统的三个次级制度系统——媒介宏观管理制度(媒介体制)、采编制度和经营制度之间相互关联, 具有较强的制度耦合性, 但同时具有一定的可分离特征, 是一种“拟分离制度系统”^③。这种既耦合又拟分离

① [美]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1995 年。

② 张旭昆:《制度演化分析导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13 页。

③ 制度演化理论认为, 制度系统间存在互斥关系, 也存在耦合关系。制度的耦合关系又可细分为强耦合关系和弱耦合关系。强耦合关系是指一项制度的变化将导致与它有耦合关系的其他制度完全丧失功能; 弱耦合关系是指一项制度的变化将降低而不是完全丧失与它有耦合关系的其他制度的功能。而现实的制度系统往往既不是可分离系统, 也不是非分离系统,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称为“拟分离制度系统”, 见张旭昆:《制度演化分析导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1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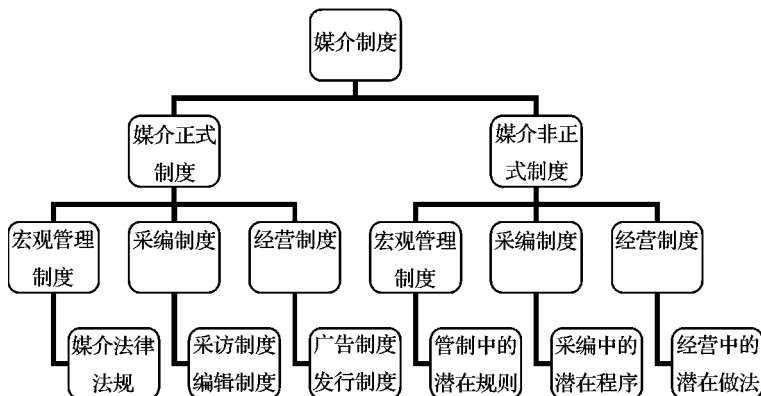


图 0-1 媒介制度的分类与内涵

的关系决定了媒介制度系统的演化可能不同步,有的演化较快,有的演化较慢,这是媒介制度系统的演化规律之一。

(三)媒介制度变迁

在诺思看来,“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被打破和创新。我们也可以把制度变迁看做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①。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但当某一种制度安排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这是最为经典的制度变迁理论。拉坦对制度变迁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一词用于指(1)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2)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3)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②。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观点,本书所讲的媒介制度变迁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媒介(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的变化;(2)媒介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3)支配

① 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② V. W. 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见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29页。

媒介行为及媒介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也可以将媒介制度变迁看作媒介制度从一种均衡转变到另一种均衡的过程。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文献检查可以发现,目前关于中国媒介制度及其变迁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数不少,这些相关成果将成为本书研究的坚实基础。然而,运用社会科学中制度分析的理论范式将中国媒介的转型与演化纳入到“制度变迁”视野中来考察的研究目前还没有。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关于媒介制度变迁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媒介制度变迁的现象描述多于对内在机理的揭示。笔者检索的大部分著作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嬗变轨迹(如广播发展史,电视发展史,报业发展史)着力很多,但对于这种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探讨得不够。目前的新闻史偏重于平面地描述,近现代新闻史往往按照中国革命史的线索、立场及价值判断来叙述,无法揭示媒介制度内在变迁的理路;这种偏重静态的研究使制度变迁的“变”没有得到有力揭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态逻辑没有还原出来。

第二,缺乏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对媒介制度变迁模型的建构。媒介的制度变迁看似杂乱无章,充满变数,但仔细研究确实有其内在的演化逻辑,关键看研究者用一个什么样的分析框架来进行揭示。已有研究大多流于直观式的解读,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以至大部分著作及论文在论及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时都比较简单。如陈怀林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中国传媒制度变革——以报业为例》一文,其对中国报业的制度变迁的观察与总结无疑是精当的,但将传媒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归结为唯一的“经济利益驱动”(对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核算),无疑有简单化之嫌;许多论文或著作在解释媒介制度的生成机制与演化机制时出现了“归因偏差”,或归结为政治决定论,或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而忽视了媒介自身演化的规律,忽视了知识、传统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忽视了制度形成及演化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